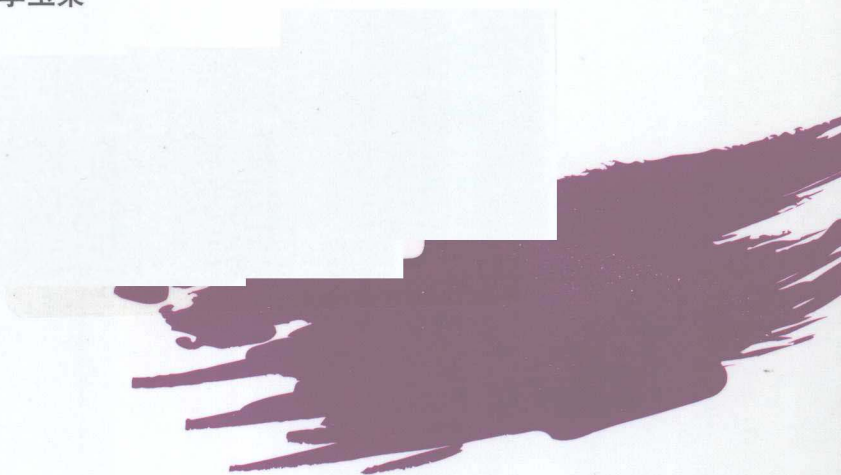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

第四卷

改革开放

主 编 汪 新 李玉荣
本册主编 孙大力



1978.12-1989.6

 华文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央档案馆编

改革开放

1978.12-1989.6



1978.12-1989.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

图画读本

第四卷

改革开放(1978.12—1989.6)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 4, 改革开放: (1978. 12 ~ 1989. 6)/汪新, 李玉荣主编; 孙大力分册主编.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75 - 2215 - 0

I. ①中… II. ①汪… ②李… ③孙 III. ①中国 - 现代史 - 1978 - 1989 - 通俗读物
IV. ①K2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3204 号

书 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图画读本: 改革开放(1978. 12—1989. 6)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75 - 2215 - 0

作 者: 总主编: 汪 新 李玉荣 本册主编: 孙大力

责任编辑: 辛 平 杜海泓 李 媚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 话: 010 - 58336255 583362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155.75 印张 725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00 元(全 6 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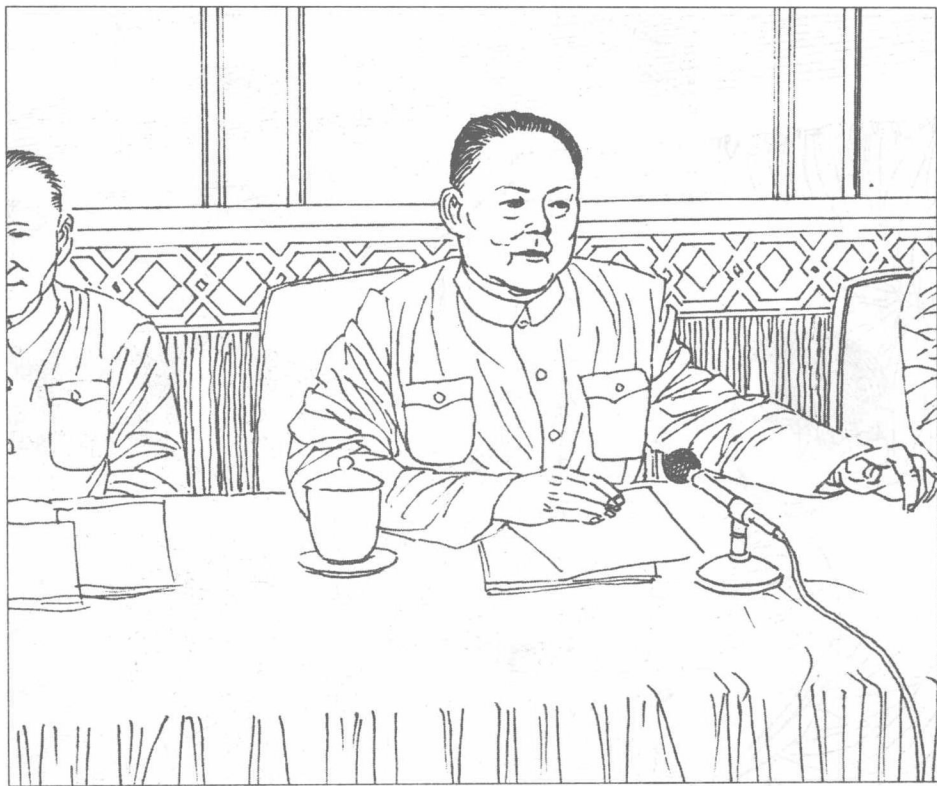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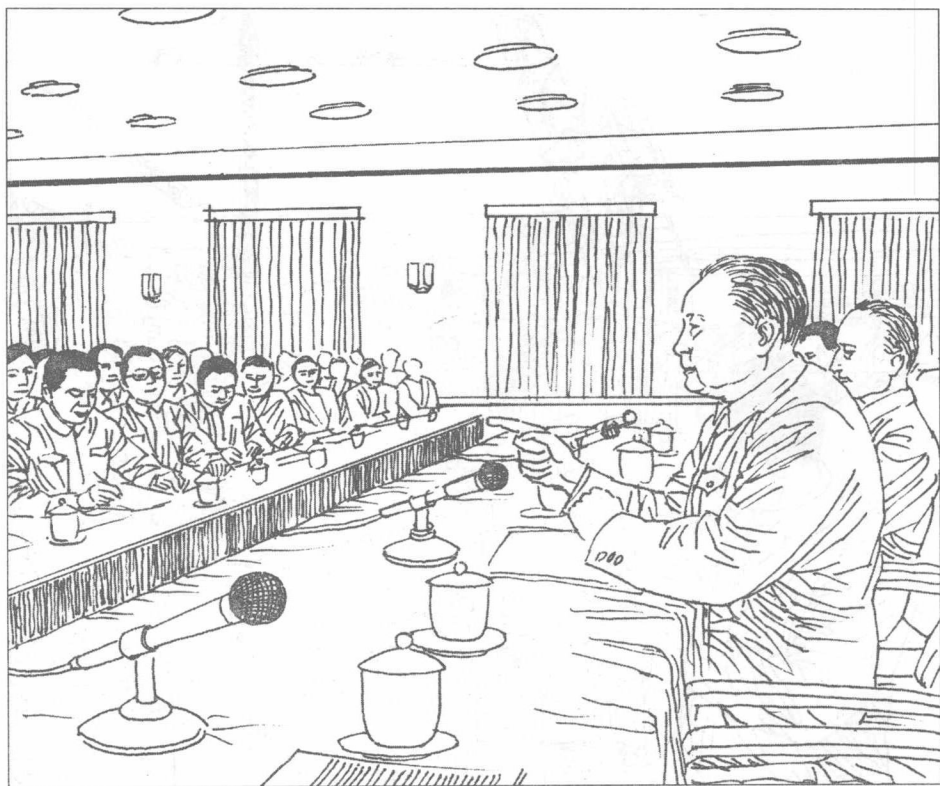


1. 引导中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高速列车是在 1978 年秋天开始准备启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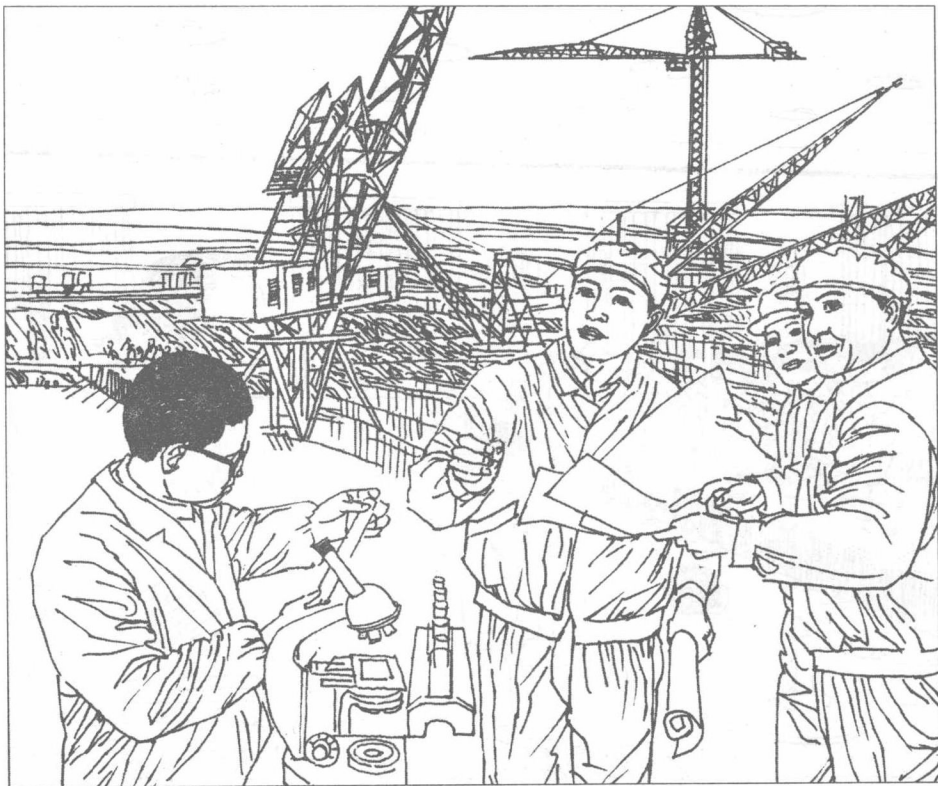
1982 年 9 月 18 日,正好是邓小平东北之行鞍山讲话四年后的这一天,在陪同金日成访问四川途中,邓小平回忆起四年前的情况。他告诉金日成:“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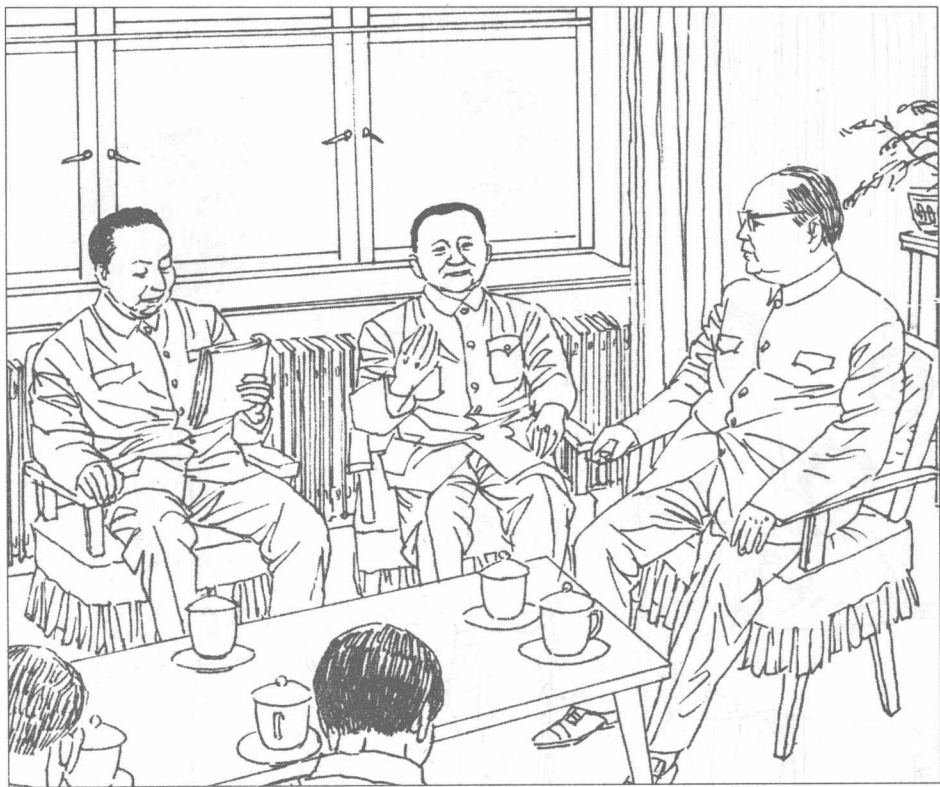
2. 1978年,在拨乱反正取得不断进展的情况下,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人民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把握住了机遇,适时地作好了调整大政方针、转移工作重点的各种准备。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务虚会。李先念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明确、大胆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主张,为改革开放的决策作了准备。



3. 李先念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是在总结建国 28 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他把在本世纪末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说成是一场伟大的革命,革命的内容概而言之就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他还讲到,要学习利用外国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的对外开放问题。显然,这些思想主张,已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设想了,这篇讲话后来被作为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文件之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4. 1978年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安排1979年、1980年计划。这次会议确定,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益、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三个转变”的思想也被写进了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中。



5. 这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提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人的赞同。华国锋也接受了邓小平的这一建议,并决定在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集体意见提出来让大家讨论。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并准备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对最终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6. 也就在这年10月,在北京上演了一来自上海的话剧,说的是天安门事件的故事,引起了轰动。话剧的名字颇有用意,借用了鲁迅“于无声处听惊雷”诗中的前半句,叫《于无声处》。此时,整个中国都期待着那声惊雷。

这惊雷,终于在新年到来之前炸响。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组讨论,并召开了3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终于炸响了那声震撼人心的惊雷。



7. 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在首都京西宾馆举行开幕会,华国锋宣布会议议程:(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同时,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



8. 华国锋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提出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全党关心的大问题。按照华国锋原定的设想,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根据邓小平会前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会议要讨论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对此,华国锋设想,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就够了,整个会议准备开 20 天。

然而,会议的进程却大大出乎华国锋的意料。

华国锋致开幕词后,许多同志对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热烈拥护,但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9. 11月11日召开了第一次小组会议,谭震林大胆提出,进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要不要解决?我看应该解决。

12日,陈云在东北组率先放了一炮。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见,接着提出了六个问题,即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平反,要为陶铸、王鹤寿等同志的问题平反,要为1937年“七七”决定和1940年决定所涉及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问题平反,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其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对康生的严重错误给予批判。



10. 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很快得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说:我赞成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作风,关系到维护毛泽东的旗帜。

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

王首道在华北组发言说:只有把遗留的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1. 与会者个个显得精神振奋,争先恐后地发言。肖克要求为“二月逆流”冤案平反,杨得志等提出要为武汉“七二〇”事件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的“一月风暴”问题要弄清楚,聂荣臻提出要解决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等问题。与会同志还提出要正式为所谓“右倾翻案风”问题平反,等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平反,为彭德怀、陶铸、杨尚昆同志平反,对康生、谢富治的揭批是合理的,地方性重大事件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地处理。并决定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几个专案组全部案件交中央组织部。



12. 华国锋以为,老干部们提出的问题他都作了交代,现在会议进程该回到他的预定轨道了。所以他要求从11月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但是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应当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谭震林发言说:中央的决定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但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讲了,大家在讨论中还可以提。有的同志大胆地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质疑。



13. 会议出现又一次思想交锋是在11月27日的分组讨论中,一位代表发言对前一段的真理标准讨论表示担忧,认为其中的分歧只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如此等等。这种观点客观上维护了“两个凡是”设置的思想禁区,对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不利,因此一提出就引起了重视。经济工作的讨论暂时搁置起来,会议的中心议题一下子转到了思想路线问题的讨论上。

与会代表在全面了解“两个凡是”方针提出的经过和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由来和发展后,对主张“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同志进行了严肃批评。根据与会代表要求,华国锋、汪东兴先后就“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了检讨和说明。